



红色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形态两个层面，包括红色歌曲、红色文学、红色电影、革命精神、革命旧址、革命遗物等等，红色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红色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以“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4部长篇小说）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源自河北的作家作品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红旗谱》《小兵张嘎》《回民支队》《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批电影红遍大江南北之后，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些风靡全国的影片全都改编自河北的作家作品。由此，河北红色文学犹如红色文学经典的华彩乐章，备受青睐、好评如潮。

红色土地滋养的红色作家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河北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片红色土地不仅诞生了马本斋、节振国、戎冠秀、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革命英雄，而且滋养了许多红色作家——孙犁、梁斌、徐光耀、李英儒、李晓明、王林、雪克、冯志、刘流、袁静、孔厥、管桦、邢野……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就是普通一兵，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或参加八路军游击队转战于敌后，或作为记者、编辑、教师、文工团员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1930年9月，梁斌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后来被称作“保定红二师”），当年即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春，保定二师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爱国护校斗争，梁斌亲身参与了这场正义斗争。同年8月，他又参加了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高蠡暴动”。抗战时期，梁斌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游击活动。

1938年初春，孙犁参加了驻扎在河北安平县的冀中人民自卫军。他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



□ 孙英臣

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春调阜平，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编辑和教员。1941年，他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他还积极参加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击退了日伪军的猖狂进攻。

也是在1938年，13岁的徐光耀成为八路军120师特务营的一名战士，并于这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他被选送去参加冀中军区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一路上，他和战友们昼伏夜出，机智地日本鬼子的炮楼间穿插，躲过敌人的巡逻队，钻进稠密的青纱帐。1942年春，日伪军5万余人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和野蛮的“五一一大扫荡”。徐光耀亲身经历了战斗，目睹了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

当硝烟散尽、和平来临，这些曾经手握钢枪的战士回眸难忘的战斗生涯，创作激情油然而生。于是，红色记忆在他们笔下蝶变为红色文学作品，河北文坛呈现出红色作家群星璀璨的壮观景象。

红色文化孕育的红色经典

历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河北红色作家，全都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革命战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他们指引了一条金光大道，他们把党性作为自己最高的精神追求，自觉地实践革命文艺方针，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把火热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源泉。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在红色文化的孕育中，河北红色作家并喷般地奉献出一批红色经典。

《红旗谱》，这是著名作家梁斌的成名作，被茅盾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小说以浑厚豪放、高亢嘹亮的艺术风格，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描写了“高蠡暴动”和保定二师学生的爱国运动，深刻表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以及农民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堪称一部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

《风云初记》，这是著名作家孙犁的一部长篇力作，这部长篇小说“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茅盾语），被誉为诗化小说的经典。作者从冀中最普通的农村、最普通的家庭写起，运用诗一般的语言细腻地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示了抗战初期冀中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争和生活情景，真实地再现了冀中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击日寇的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

《小兵张嘎》，这是著名作家徐光耀的代表作，被誉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这部中篇小说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叙述了烽火少年小嘎子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和抗日小英雄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是著名作家李英儒的代表作，叶圣陶在《读〈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文中写道：“我一口气读完这部《野火春风斗古城》，觉得‘内容说明’的末了一句‘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并非过誉。”这部小说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在隐蔽战线英勇斗争的故事，内容真实、题材新颖，人物饱满、鲜活生动，情节曲折生动、故事波澜起伏，富于传奇色彩。

此外，李晓明的长篇小说《平原枪声》，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雪克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冯志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刘流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袁静、孔厥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管桦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邢野的多幕话剧剧本《游击队长》，等等，也都脍炙人口、畅销全国，影响广泛、享有盛誉。

红色经典塑造的英雄形象

小说艺术最重要的特征是塑造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艺术

形象，河北红色文学作品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在于刻画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形象，这些红色经典里的英雄人物集结在一起，就是一部燕赵群英谱。

《红旗谱》主人公朱老忠的形象可谓光彩夺目，他既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爽之气，又有“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精神；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的反抗性格，又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身上，不仅展示了中国农民英勇、豪爽、酷爱自由、坚忍不拔的鲜明性格，而且反映了中国农民的觉悟过程和斗争历程。由此，朱老忠便成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的艺术典型。

《小兵张嘎》主人公小嘎子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非常成功，他既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又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他在革命过程中有着孩子气的冲动，缴获敌人手枪后不肯上缴而想据为己有，为争夺木头手枪和胖墩儿打架时咬人，还堵了人家烟囱。但在部队领导的培养和教育下，他进步很快，与侦察员罗金保化装侦察、活捉了胖翻译，在据点里配合游击队拔掉敌人炮楼。这个抗日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备受少年儿童喜爱。

《野火春风斗古城》主人公杨晓冬的形象，是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在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中

刻画出来的。他以失业市民的身份打入敌占区，在隐蔽战线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在地下交通员金环的有力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分化瓦解敌人、促成伪团长关敬陶起义等战斗任务。有论者高度评价这一英雄形象，欣喜地赞誉作家李英儒，“为我们人民革命斗争的英雄画廊里，挂上了珍贵的一幅”。

如果说上述作品都是以主人公为典型塑造英雄形象的话，那么《烈火金钢》则是塑造了英雄群像。这部小说以冀中军民反“扫荡”为背景，通过环环相扣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形象，其中有跟主力部队离散的八路军排长史更新，有艺高胆大、机智勇敢的飞行侦察员肖飞，有挥舞大刀、勇猛刚毅的骑兵战士丁尚武，还有区委书记齐英、女区长金月波、民兵队长孙定邦等等。这些英雄人物犹如生铁投入熔炉一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锤炼成钢。

除此之外，《平原枪声》里的马英，《敌后武工队》里的魏强、贾正、刘太生，《腹地》里的辛大刚，《战斗的青春》里的许凤、李铁，《游击队长》里的李向阳，《新儿女英雄传》里的黑老察、牛大水，《小英雄雨来》的雨来，等等，都是许多读者耳熟能详的英雄形象，在长长的英雄画廊里熠熠生辉。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河北红色作家奉献的红色经典自从问世以来畅销不衰，不仅当年曾入选中小学课本，被改编为电影、戏剧、评书、连环画，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后又陆陆续续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有的作品还多次重拍。这些红色经典已经成为我们开展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的红色宝库，成为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阔步前进的动力之源！



老舍之「老舍」

□ 施崇伟



老舍先生在《我的理想家庭》里写道：“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把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二小桌。”

那么，他人生中的“七间小平房”在哪里呢？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老舍和北京分不开，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1949年前后，老舍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共有十处。他住得最久的是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新中国成立后久居于此，直至辞世。

老舍故居是座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如今已是文物，可供参观，但得遵守一条条的规矩。进去了，随便看，却不可以随便摸。老舍向来看和摸，如果他在，才不会这么板着脸孔。正门坐西朝东，灰瓦门楼，门扇为黑漆油饰。进门是座砖砌影壁，中心贴个大红“福”字，这是中国人民家的习惯。步入紧凑的院落，但见小院



老舍北京故居

“铜钱”中映射的鱼水深情

□ 任传玲 刘琪瑞

在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有个关于“铜钱”的故事流传至今。

兰陵县曾叫赵钁县。1944年2月，为了纪念革命烈士赵钁，中共鲁南区委、鲁南行政公署曾在大部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将赵钁生活战斗过的临、郯、费、峄四县边区县委更名赵钁县。

赵钁（1906—1941年），陕西府谷县人，抗战时期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鲁南区委党校校长兼鲁南军区政委。1940年初夏，赵钁带队检查工作，行军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到路边老百姓的瓜田里，踩坏了两个西瓜。赵钁非常痛惜，从马槽子里摸出2枚铜钱，放到西瓜上作为赔偿。第二天，他又专门找到瓜田主人赔礼道歉。

1941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实行频繁“蚕食”“扫荡”的情况下，全面进攻驻鲁南地区党政机关，偷袭中共鲁南区委驻地银厂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银厂惨案”，杀害我干部群众30人。在银厂惨案中，为保护党的秘密文件，赵钁不幸被捕，被敌人活埋于当地的九女山下。就义前，他面无惧色、慷慨陈词，用生命最后一刻讲了最后一堂党课。中共鲁南区委致赵钁烈士妻子李岩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述：“在临难前，他以敌人的刑台做讲台，争取最后五分钟为党工作”，赵钁的演讲“感动了执刑士兵，回来连呼惋惜；震动了刽子手匪徒，认为自己作下了塌天大祸，而坐卧不安”。

赵钁牺牲后，当地群众自发筹集80斤铜钱，熔化后铸成赵钁铜像镶嵌在文峰山赵钁墓前。敌人知道后，数次前来破坏，用大炮轰击赵钁墓，并撬走铜像试图毁掉，但最终没有得逞。1947年初鲁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全歼了国民党第26师及快速纵队，赵钁烈士的铜像又被夺了回来。当地群众放鞭

炮、吹喇叭，给赵钁烈士的铜像披上红绸，庄严地重新敬在墓前。70多年过去了，而今，兰陵县委在文峰山麓以赵钁烈士事迹为主线建成的党性教育基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寻找初心的精神家园。每到清明节，当地很多群众手捧鲜花，自发汇聚在赵钁墓前，表达对烈士的敬意与缅怀。

军马踩坏了西瓜，他掏出2枚铜钱赔偿瓜农；死后，群众捐出80斤铜钱为他铸像，这看似不相称的两组数字，构成了特殊的“等式”，这里面凝聚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情谊！

2枚铜钱的故事，只是鱼水深情的一个缩影。赵钁牺牲前，在艰苦的革命和斗争中，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1940年8月，赵钁带领鲁南区委委机关人员，穿过国民党顽军683团的封锁线，看到路旁边有一匹军马在吃田里的大豆，就问战士为什么不制止？战士说：“这里是敌占区，吃点没关系。”赵钁很严肃地说：“敌占区的庄稼是群众种的，敌人不会种，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爱护群众利益。”

还是这年的仲秋，临邪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成熟了，黄澄澄、红艳艳，丰收在望。可如果老百姓收割了大片大片的青纱帐，我们的队伍再借什么以掩护、隐蔽，开展对敌斗争呢？1940年是反扫荡对敌斗争极为艰苦的一年，形势分外严峻，因此当地干部通知群众只收玉米棒和高粱穗，不要砍秫秸。而当地烧火做饭主要靠秫秆，再者正值秋种时节，农时、墒情不等人，老百姓急需腾茬耕地，播种小麦，于是有的农户没有按照要求去办，把玉米和高粱秸砍了，准备秋种。在劝阻过程中，有些干部与群众产生了矛盾。赵钁了解到这一情况，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他说：对群众不要强迫命令，可以

动员群众晚砍些日子。群众要烧火，要种地，高粱秸迟早是要砍的。没有了青纱帐，依靠群众挖交通沟，照样可以隐蔽自己，打击敌人。经过赵钁的批评教育，当地干部迅速纠正了这一做法。

一打铜领不如一个行动，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的优良作风就这样感动着迢迢八百里沂蒙。传承着红色基因的八路军来到沂蒙山，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还主动帮助群众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树皮；挖野菜也远离村庄，把附近的野菜留给老百姓。

“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正是无数个像赵钁这样的共产党人忠实地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党才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在沂蒙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吃的是乡亲们筹的粮，住的是老百姓让的房，穿的是红嫂们缝的衣，受伤躺的是老乡抬的担架，遇到危险靠的是群众掩护，养伤靠的是乡亲照料，急行军实在没办法，过的是“识字班”们肩扛的“火线桥”……秉持初心、以心换心、党群同心，这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蕴含的红色基因。2枚“铜钱”中映射的党群同心、鱼水深情见证着历史，昭示着未来。在党的领导下，沂蒙发生了沧桑巨变，其根脉、源泉、力量，都蕴藏于这党群同心、鱼水深情里！

（作者单位：山东省兰陵县委党校；山东省郯城县人大常委会）

